中國無政府主義

中國無政府主義的雏形可以追溯至先秦的道家思想,而近现代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则源于早期的反清活动,这种思潮在 20 世纪初中国改革和革命运动中有极大的影响力。在清朝被推翻之前和之后的几年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认为真正的革命并非只是政治性的,即不能用一个政府取代另一个政府,而是必须推翻传统文化并创造新的社会制度,特别是要推翻中国的家庭结构。

留学日本和法国的中国学生热切地学习无政府主义学说,以先了解自己的祖国,然后再改变; 19世纪后期俄罗斯的<u>虚无主义和无政府共产主义</u>运动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无政府主义造成了主要影响。尤其中国革命人士里的部分秘密组织提倡将暗杀作为一种工具,类似于俄罗斯反沙皇组织的自杀式恐怖袭击。然而,到了1920年代,随着<u>中国国民党</u>决心在在中国镇压无政府主义以及<u>中国共产党</u>所带来的<u>共产主义和毛泽东思想</u>的兴起,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失去基础。<u>中华人民共和国</u>建国后,一些无政府主义倾向开始在中国蔓延,从<u>文化大革命</u>延续至<u>改革</u>开放直至21世纪之交。

起源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思想可上溯于<u>哲学</u>上的<u>道家</u>,道家最早在中国古代<u>春秋</u>时期发展起来,并被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奉为其无政府主义态度的来源。道家圣人<u>老子和庄周</u>的哲学是基于"反政治"的立场,拒绝参与任何形式的政治运动或组织,并在《<u>庄子</u>》和《<u>道德经</u>》中发展了一种"<u>无为而治</u>"的哲学,许多道教徒因此过着无政府式的生活。关于劝告统治者无为而治是否属于无政府主义的范畴,一直存在着争议。在混乱的<u>魏晋时期</u>,出现了具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新一代道教思想家。道教的原则更类似于哲学上的无政府主义,试图将国家的权力下放并质疑其道德实质。道教和新道教是<u>和平主义</u>的思想流派,与几个世纪后的许多西方无政府主义同行形成对比。

改良主义和革命运动的开端

<u>洋务运动</u>期间,与欧洲人直接接触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对欧洲列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产生兴趣。一种<u>国族认同和世界主义</u>意识开始发展,主张将中国从一个帝国转变为一个<u>民族国家</u>,以确保其在面对外国侵略时在未来得以生存。自此<u>中国民族主义</u>得以兴起,它实际上主张一种<u>人民主权</u>的形式,但却不被执政的以<u>儒家</u>思想为指导的<u>清廷</u>所接受,他们保守地希望保留帝国的固有体制,因此在 1880 年代将许多民族主义者赶下台。这导致许多民族主义运动围绕着革命共和主义的理想进行重组,呼吁结束清朝的统治。

清初的思想家谴责将私利置于公利之上的君主,第一代中国民族主义者在其影响下将目标定为将中国社会和国家有机地结合起来,<u>梁启超</u>等改革者主张通过民主制度实现更大的政治参与。与民族主义者们的意图相反,他们通过探究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提出了社会与国家的对立问题,以及个人自治与政治集体的对立问题,事实上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些日益增长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甚至可以从梁启超自己的话语中看出,他指出他所信奉的民族主义"不允许别人侵犯我的自由,也不允许我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别人",并主张通过消除所有政治和社会限制来培养市民的自觉性。

<u>甲午战争</u>的失败导致<u>洋务运动</u>瓦解,催生了<u>兴中会</u>等一批新的革命民族主义组织,以及<u>公车上</u>书运动等有组织的政治改革运动。与此同时,光绪帝进行了<u>百日维新</u>,但也被保守派政变所击败,慈禧太后软禁了具有一定改革意识的光绪皇帝,下令公开处决改革的主要倡导者,如"戊戌六君子"。

清朝支持的<u>义和团运动</u>失败后,清政府终于被迫开始实施改革,以试图保持王权。正是在这一时期,年轻的中国激进分子首先被无政府主义所吸引,受到俄国<u>虚无主义</u>运动的启发,开始了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随后发生了多次反清起义,但最终都没有成功。一些最早的无政府主义作品是在这一时期和随后的几年中出版的,例如《俄罗斯大风潮》,由<u>马君武</u>根据托马斯·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一章翻译扩充,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著作。

无政府主义的早期发展

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许多富裕家庭的子女在满清政府新设立的留洋计画下出国深造,中国无政府主义思想便在法国和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里进一步成长。 到了 1906 年这个计画已经送出约 500—600 名学生至欧洲、约 10000 名学生至日本。日本的东京由于地理上较接近中国、相对而言花费也较低,同时两个国家也较为类似,成为当时最多留学生前往的地方。在欧洲,巴黎成为特别多中国留学生前往的地方,也是因为相对而言较低廉的费用,法国政府也协助补贴学生的花费,同时法国也被视为是西方文明的中心。 依据一些说法,满清政府进行留洋计画的一部分原因是希望将这些激进的学生送离中国,而最激进的学生被送往欧洲,较为温和的学生则送往日本。 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话,满清政府的做法显然是非常无知的,在欧洲的学生很快便接触到了当地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将那些意识形态和做法完全带回中国社会。 相当有趣的是,无政府主义很快便成为两地学生吸收最多的西方意识形态,到了 1906 年左右,巴黎和东京两地成立了无政府主义的学生团体。两个不同的地点、也或许当初所分隔的两种不同倾向的学生,最后导致两地产生了不同形式的无政府主义

巴黎派

1900年前后,吴稚晖、李石曾和张静江三人互相结识,随后李石曾和张静江同船前往法国留学。 依据李石曾所言,对巴黎的中国留学生团体的影响分为三个部分,包括激进社会主义(Socialist Libertarianism)与无政府主义、达尔文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古典的中国哲学。 比起东京的留学生团体,巴黎的留学生们更不愿接受老子以及古时的井田制度思想。李石曾描述当时巴黎团体里的成员都是一些曾在中国受过良好文言教育的年轻学生,也都坦承这些教育对他们的影响,但他们仍然排斥、甚至主动反对将任何中国传统文化与无政府主义扯上 关系的行为。

1906年,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u>蔡元培</u>等人在法国巴黎市区达庐街 25 号创办了"世界社",这是中国第一个中国无政府主义组织;同时发行《<u>新世纪</u>》周刊,在舆论上支持<u>孙中山</u>的革命活动,随后这几人加入了<u>中国同盟会</u>。但是,与同盟会的同伴们不同,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们主张从下向上的推动社会革命,建立<u>共和制和立宪制以彻底重组社会</u>,并最终进入无政府主义社会。他们观察到,在欧洲,通过政治革命建立的民主共和制被用来维护资本主义利益并使工人阶级贫困化,因此认为中国的社会革命根本上仍需要采取根本性的反国家和反资本主义的理念。

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存在对一般性政治革命的反对态度,这招致了民族主义者的批评,因为民族主义当时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足够对抗帝国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无政府主义对这一目标不利。例如,1908年有一位读者在给《新世纪》的一封信中表示:

如果你们这些人只知道空喊:"我们不要政府,不要士兵,不要国界,不要国家",说你们是 为了普遍的和谐、正义、自由和平等,我担心那些只知蛮力而不知正义的人将聚集他们的军 队来瓜分我们的土地和人民。

巴黎派随后批驳了中国因为需要反对外来入侵而需要支持民族主义,或是认为无政府主义会导致外国入侵的观点。李石曾在《新世纪》上发文回应称,其一,外来入侵并没有改变压迫的本质,仅是加重了革命者的负担;其二,既然革命是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其他国家会忙于应付自己国家内国民的压力而无暇侵略中国。此外,李石曾还表示支持民兵,认为正规军仅在保护统治者的利益,而民兵比正规军能更有效地保卫国家。

未京派

1900年前后,社会主义思想开始传入日本。1902年至1904年期间,日本出版了许多介绍无政府主义的书籍。这些社会主义思想强烈的影响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不少同盟会会员参与了日本的社会主义社团,许多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也参加同盟会

尽管同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东京派的无政府主义者们有着不同的倾向。 巴黎的学生们推 崇西方的科学和文明,东京的学生们则将无政府主义的根基建立在亚洲政治的传统上,东京 无政府主义者极大地借鉴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例如被他们视为 中国无政府主义之父 的老子,以及许行,其农业主义哲学深深地启发了日本无政府主义学生的农业乌托邦理念。

1903 年,刘师培和<u>何殷震</u>结婚,迁居<u>上海</u>。并加入<u>光复会</u>,刘师培在其中发展了"国粹"学说并编纂了《国粹学报》杂志,而光复会的创始人之一<u>蔡元培</u>则在爱国女子学校监督何殷震的教育。该协会在上海的活动很快遭到政府打压,这对夫妇被迫流亡东京,在那里他们加入了一群向他们介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革命者。这对夫妇继续建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开始推动结合了反现代主义和农业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在刘师培看来,近代<u>儒家和道家对自由放任政府的倡导遏制了中国封建帝制对社会的干预,这使得中国在短期内比那些短期内通过中央集权建立的民族国家更可能实现无政府主义。因此,他认为保留旧政权比建立新政权更可取,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和议会政治只会加剧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u>

请政府的应对

1904年,无政府主义刚刚传入中国时,清政府就已开始着手应对。包括《<u>浙江潮</u>》、《20世纪之怪物》、《社会主义广长舌》等反满革命期刊均被查禁。1907年,《<u>天義報</u>》、《新世纪》等刊物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惧。<u>外务</u>庶务司在致各地将军的信中称这些刊物"革命排满,畅言无忌,荒谬狂悖,专事煽惑"、"散布各行省,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实足为地方治安之害"。<u>军机处</u>也要求沿海各省份的官员查禁相关刊物,阻止其在中国流通。1907年7月,清政府照会各国使馆要求协助查禁无政府主义资料流通。除查禁、禁止流通外,清政府还派遣官员前往各国使馆监视留学生动向,阻止他们参与当地的无政府主义活动,出版无政府主义刊物。

暗杀团

巴黎派和东京派都没有积极参与暗杀活动,但对那些参与暗杀活动的组织抱有好感,受行动 宣传理论的启发,当时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认为,通过自我牺牲进行暗杀可以促进革命事业

1905 年,<u>刘师复</u>加入<u>同盟会</u>,开始从事暗杀活动,他曾试图刺杀广东水师提督<u>李准</u>,不过不仅计划失败,自己还失去左手、入狱约三年;巴黎派的<u>汪精卫</u>早年活动时也曾受革命党中无政府主义的暗杀之风影响,他曾谋划刺杀清朝<u>摄政王载沣</u>,但计划同样失败,于 1910 年3 月在北京被捕。此后,<u>刘师复和陈炯明</u>建立了支那暗杀团,该组织的行事风格深受<u>民意党</u>和黑手党的影响。该组织曾在广州特别活跃,参与了该地在 20 世纪之交经历的各种起义。

辛亥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

1895年起,从广州开始,<u>同盟会</u>及其前身<u>兴中会</u>领导的反清起义开始席卷全国,但均失败。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普遍支持起义,他们普遍认为如果出于道德目的,暴力就是正当的,且在专制条件下是必要的;如果能激起群众对革命事业的支持,暴力就是有效的。

为回应清政府对<u>保路运动</u>的镇压, 1911 年 10 月 10 日, <u>新军</u>分子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 发动<u>武昌起义</u>, 废黜了当地的政府并控制城市。这次成功的起义引发了<u>辛亥革命</u>, 革命共和派在中国各地拿起武器推翻清朝。当革命浪潮于 10 月 25 日抵达广州时, 清军将军<u>凤山</u>在抵达广州后几分钟内就遭到革命党人刺杀。随后, 无政府主义者<u>陈炯明</u>组织了地方民兵, 在广东各地发动起义, 占领了<u>惠州</u>, 宣布该省脱离清帝国的统治。许多其他省份也纷纷效仿, 最终宣统皇帝退位, 中华民国成立。

巴黎派无政府主义者在民国初期发展迅速,在辛亥革命后不久,巴黎派陆续返回中国,他们开始特别关注教育问题。<u>李石曾、蔡元培</u>等人发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被吸引到法国,并在当地接受了激进思想。巴黎无政府主义者保留了其根源上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为此还成立了美德促进协会性质的"进德社"等小型团体,禁止成员从事<u>嫖娼</u>、纳妾、<u>赌博</u>、食肉、饮酒、<u>吸烟</u>等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无政府主义

<u>中华人民共和国</u>成立之际,许多无政府主义者逃往<u>香港或台湾</u>,有些甚至远走<u>法国或美国</u>。尽管如此,也有相当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选择留在中国大陆。比如<u>巴金</u>,在加入<u>中国作协</u>后,他的作品受到了审查,避免出现任何提及无政府主义的内容,他也因此基本上停止了写作。在<u>反右运动</u>中,巴金还被指责为"右倾作家"。

1958 年 3 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首先是阶级消亡,而后是国家消亡,而后是民族消亡,全世界都如此。"随着大跃进的开始,人民公社随之建立,这一组织形式设立是为了"行使国家权力职能",它在毛看来是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关键一环,被视为"国家自行消亡"的第一步。这种结束国家主义的承诺对许多中国农民特别有吸引力,他们被公社所吸引,因为他们渴望从官僚手中获得自由。但毛本人在评论公社的状况时认为,"现在有些半无政府主义,'四权'(人权、财权、商权、工权)过去下放过多、快了一些,造成混乱"。在一系列党的会议之后,官僚权力在农村干部身上得到重申,国家对公社的集中控制得以建立,纯粹的按需分配被抛弃,私有制和按劳分配重新被引入。随后的官僚管理不善,再加上自然灾害,导致 1959 年至 1961 年的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师复



师复(1884 年—1915 年),原名**紹麟**,字**兆彬**,是 20 世纪早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

生平

1884年生于及原籍中国广东省香山县石岐镇, 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5月成为同盟会会员。 1910年在香港成立支那暗杀团,进行反清反殖民活动。 1912年暗杀团解体后成立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舍、心社, 发行刊物《晦鸣录》、《民声》。 为实践理想而担负刊物所有的工作。 刘师复关注民族和道德议题,反对国家权力,提倡绝对自由。 是中国早期世界语的学习者之一。

闽南护法区 - 中国无政府主义军政府

概述

1917 年 12 月,<u>孙中山</u>领导的<u>广东护法军政府</u>组建援闽粤军,总司令为陈炯明。 1918 年 4 月起,陈炯明兵分三路向<u>福建</u>进攻。经百余战,援闽粤军于 9 月 1 日攻占<u>漳州</u>, 建立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形成福建护法区(后称闽南护法区),基本控制原<u>汀州府</u>、<u>漳州府</u>各 属县以及安溪、德化、大田等县,共 26 县。

11月30日, 护法军政府政务会议任命陈炯明为福建省省长;

12月12日,又让陈炯明兼任"会办福建军务"。

12月6日,闽粤双方达成停战协议。援闽粤军在护法区进行为期两年的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u>共产国际</u>机关刊物《<u>共产国际</u>》称"漳州是中国南部革命的中心"。

1920年8月12日,根据闽粤双方约定,援闽粤军回师广东,闽南护法区遂撤销。

政治传制

1918年9月,陈炯明在闽南护法区内沿用旧制汀漳道,管辖26个县;

任命洪兆麟为汀漳镇守使,下设政务处、警务处、高等法院、财政局、工务局和教育局等。闽南护法区政权稳固后,陈炯明着手建立地方各级权力机构。在地方官员配置上,任命制、聘任制、荐举制并行,将政府权力下放到地方士绅和开明人士手中。援闽粤军总司令部只负责地方县长任命。道尹熊略、镇守使洪兆麟、政务处处长徐桴、警务处处长<u>丘哲、龙溪</u>知县張友仁、海澄知县尹骥、东山知事陈策、漳平知事熊子勋、宁洋知事黄凯,都是直接从军官中择用加予委派履职的。财政局局长钟秀南和高等法院院长郑丰稔以及一些县知事,都是通过任命当上职官的。工务局局长周醒南、教育局局长梁冰弦、《闽星》社主编陈秋霖,则是从广东择贤邀聘而来的。<u>清流</u>知事区戊圻、<u>建宁</u>知事吴海清、<u>将乐</u>知事朱泰谟,可以说是由当地贤达士绅荐举的拥护约法又众望所瞩的开明人士充任的。

漳州新政

在信仰<u>无政府主义</u>的陈炯明主持下,漳州建设第一座钢筋水泥桥梁、第一条四车道石板马路、第一个现代公园(漳州第一公园,今漳州<u>中山公园</u>)、第一片城乡公路网、第一家银行,还建设贫民工艺厂、迎宾大旅馆,拆除城墙改成道路,引进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在漳州第一公园的门口,竖着高大的石碑,四面分别篆刻着"博爱、自有、平等、互助。"陈炯明大力延揽全国人才,包括一批"自由社会主义者"(中国无政府主义者<u>师复</u>的同志们),帮他一起办教育,并筹办大学。1919 年夏,陈炯明从广州专门聘请梁冰弦任教育局长。

此外,在各县设立劝学所和教育行政专员,改革旧教材。陈炯明在农村设立现代学堂,做到"一乡一校"。禁绝私塾,设立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1920年,又增办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当年就设立半夜学校 90 余所。闽南护法区还派遣了数百名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包括后来的中国托派领袖郑超麟。报纸杂志也纷纷涌现,《闽星》半周刊和《闽星日刊》出现,《闽南新报》《闽锋周刊》《军事日报》《云中周刊》也先后创办。陈炯明在《闽星》发刊词里写道,"思想一变就会打破旧生活、旧组织,直向进化线上,一起大努力,创造新生活、新组织,达到无国界、无种界、无人我界的境地······",并明确提出"全人类社会主义"。《闽星》半周刊,《闽星日刊》的编辑人员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两份报刊大力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特别是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也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为推进社会教育工作,建立了闽南社会教育社。该社演出过<u>易卜生</u>的《<u>娜拉</u>》和一些自编的剧目;陈炯明拨款500元补助,并撰写募捐启事。

为提倡体育活动。1919年秋在漳州南校场举行闽南护法区运动大会。参加者有辖区 17 县选手

为破除迷信,拆除漳州府城隍庙,毁坏玄妙观的神像,但原拟拆除的新桥头大庙,却因庙方向护法区当局缴纳财物而作罢。在革除陋习上,提倡男人剪短发、不留辫,穿短衣、不穿长衫,女人不缠小脚。当闽南护法区运动大会举行时,在进口处贴上禁令:"穿长衫或留辫子者,不得入场"。

1920年,<u>美国</u>驻<u>厦门</u>领事发给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称"陈氏······施行各种市政改革,他用的手段,近乎革命;但成效极佳,结果人民都感满意。这令中国人看到,事可办成,不必需要过度辛劳和重税。"他还特别提到了漳州宽广的道路,良好的治安,公园、公共菜市场、屠宰场、河堤以及漳厦公路。

在陈炯明的努力之下,闽南 26 县被时人誉为"模范小中国"、"闽南的苏俄"。

缺点

粤军入闽的主要目的是整训军队,补充兵员和补足装备。为此,筹饷成为战争工作。陈炯明设立筹饷局,向富户派款,设立各种捐税项目。在漳州,民众对苛征钱粮不满,发生冲突。洪兆麟与当地豪强勾结,剥削人民,引发民愤。组织粤军纪律废弛,官兵敲诈勒索,引发民怨。当地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运动,却被陈炯明镇压。无政府主义者张民权多次宣传,发起军警打压。学生公愤爆发,责毁教育局,要求释放学生。漳州州长发布影片,批评者被捕,幸得求情获释。

与苏俄的关系

闽南护法区的各方面成就,引起<u>苏俄</u>政府重视。1920 年 4 月 29 日,自称为苏俄代表的路博(即<u>阿列克谢波达波夫</u>)将军在<u>上海</u>会见孙中山后,转道漳州访问陈炯明。路博带来苏俄领导人<u>列宁</u>的亲笔信,内容大意是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怀,对陈炯明表示敬佩和鼓励。路博还转达列宁请陈炯明多做<u>农民运动</u>,注意发动群众等意见。陈炯明热情接待了路博,并请路博转交他给列宁的信。陈炯明在信中表示支持列宁及其从事的事业,希望"新中国与新俄国将如同挚友一般携手并进",并宣称"我更坚信布尔什维克主义定将造福于人类,我愿将尽全力将布尔什维克主义原则传播到全世界"。